

汉代辞赋研究

◎ 孙 晶 著



文史哲博士文丛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辞赋研究/孙晶著. —济南:齐鲁书社, 2007. 7

ISBN 978 - 7 - 5333 - 1823 - 9

I. 汉… II. 孙… III. ①楚辞—文学研究—中国—
汉代②赋—文学研究—中国—汉代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050 号

汉代辞赋研究

孙 晶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270 千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33 - 1823 - 9

定 价 25.00 元

序 一

李炳海

孙晶博士的《汉代辞赋研究》一书即将出版,其中多数章节曾作为单篇论文发表,本人在论文发表前或问世后陆续读过。今天翻阅这部书稿,有一种亲切感,并且感触颇多,略陈于下。

这部著作的主体部分是孙晶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是倾注多年精力的呕心沥血之作,有许多学术亮点。学术研究贵在创新,而能实现学术创新的关键是研究者要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围绕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孙晶的这部著作,许多章节都可以独立成文,是围绕某些难点和疑点展开论述,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她的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都是对那些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分别加以研究的结果,采用的是由微观到宏观,由个别到一般的操作程序。这部著作具有比较完整的体系和合理的结构,但是,这种体系和框架并不是论文写作之初就已经确立,而是在单篇论文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形成的。当然在成书阶段,也对原有的单篇论文进行了必要的编排和调整。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多年来陆陆续续撰写的单篇论文,就不会有这样一部体系完整的书稿,更不会有众多的学术亮点。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与当前许多博士论文的写作形成鲜明的对比。博士论文

写作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况:在搜集材料的的基础上设计出结构框架,然后按照设计出的框架向内填充材料和观点,最后构成体系。这种操作方式并非一无可取,但其中忽视了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对相关问题的发现和探索。由此而来,所写成的论文虽然具有完整的体系、合理的结构,但缺少创意,很难见到学术亮点,这样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当今已是批量生产,屡见不鲜。博士论文的写作有时间的规定,到了最后阶段,还须落实到每天、每周的进度,必须完成多少字数。其实,博士论文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不是靠写,而是靠想,就是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思索和探讨。如果没有这个环节,所写出的论文只能是以字数的繁多掩盖闪光点的匮乏,即所谓的以数量对质量,成为平庸之作。

这部著作把汉代辞赋作为研究对象,选择的的是一个热门话题,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从古至今的一门显学。这个课题要想有新的突破难度很大,但孙晶却在许多方面言前人所未言,得出许多富有创见和启示性的结论,显示出很强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超越意识。硕士、博士论文选题难已经成为普遍的问题,作为先秦两汉文学,这方面的困扰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拓展学术空间寻找学术上未开垦的处女地就成为一种学术风尚。孙晶是在前人已经深耕细作的学术园地上进行耕耘,却依然能够有所发明。这一事实向人们昭示,开辟新的学术领域固然重要,同时,从人们熟悉的研究对象中挖掘出新的有价值的因素同样必要。问题的关键是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本身是否有对相关现象具有深加工的精神生产能力,如果不在研究者本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上下功夫,只想在选题的新颖上取胜,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甚至会把很好的学术选题做糟,造成学术资源的浪费。

这部著作在坚持文学本位的同时,还涉及哲学、美学、儒道思想以及中外文翻译的问题,采取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审视汉代辞赋。这种研究方法是可取的,并且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和采用。同是在大文化背景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却出现两种不同的操作方式。一种方式是把某些文学现象与哲学、历史、美学等相勾连,用其他学科的观点、理念对文学现象加以解释,把文学作品看作是其他学科观点、理念的载体,这样做的结果,把文学说成是其他学科观念、理念的注脚,甚至用其他学科的观点、理念来笼罩和框定相关的文学现象,从而导致丧失文学本位,文学的特质被遮蔽。另一种处理方式是从文学本位出发,从文本实际出发,认真考察其他学科的观点、理念如何内化为文学作品的意象、结构及外部形态,揭示出这种融汇所产生的文学效应。前一种处理方式是从文学作品以外的其他学科进入作品内部,后一种处理方式是从文学作品内部扩展到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前一种处理方式是在大文化背景下审视文学,又从大处入手处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后一种处理方式是在大文化背景下审视文学,同时又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从具体因素入手去梳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两种处理方法似乎差别不大,但所产生的效果却迥然不同。在前一种情况下,展现的是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外部联系,以现象的罗列为主;在后一种情况下,揭示的是文学与其他学科观点、理念水乳交融的关系,已经触及文学的深层和规律。孙晶的这部著作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她不乏大文化的视域,同时又长于对文本具体因素的提炼,把哲学、美学等相关学科对文学的渗透,从多方面充分显示出来。

这部著作的主体部分是孙晶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

告,是她多年辛勤探索的结晶。为了出色完成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孙晶对相关文献做了几近穷尽式搜索,并且做了认真的辨析,这从书后附录《〈全汉赋〉句读订正数例》可见一斑。在同时代学人中,孙晶的勤奋刻苦、坚韧不拔是非常突出的。天道酬勤,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使她的理论思维不断强化,同时也使她具有悟性和灵气,一步步走入学术殿堂。

我在东北师大任职期间,作为导师和她就博士论文的相关问题进行过探讨。在博士后期间,王钟陵先生的精心指导使她的视野更加开阔,理论素养明显提高。尤其她对域外赋学的探讨,完全得益于钟陵先生高瞻远瞩的点化。

对于一位学人来说,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学习探索,往往成为日后研究的基石,有的人甚至终生未能再有所超越。在祝贺孙晶这部著作出版的同时,相信她会在学术上不断地超越自己,在更广阔的领域中继续推出创造性的成果。

2006年12月14日

于北京颐和山庄寓所

序 二

王钟陵

—

孙晶副教授原是李炳海教授的高足,2002年来苏大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研究,我是她的指导教师。她出站后到烟台大学任教,将博士论文与博士后出站报告合在一起,名为《汉代辞赋研究》,交齐鲁书社出版,并打电话给我,希望我为她写篇序。我推辞了,嘱她请她的博士生导师李炳海先生写,我觉得在孙晶的成长中,李先生的贡献比我大。后来,李先生为她写了序,但只说到博士论文部分,即《汉代辞赋研究》的下编,李先生还在他的序中讲明上编部分是我指导的。于是孙晶同学又打电话来,再次请我为她的书作序。李炳海先生以君子不掠人之美的美的谦恭态度点了我的名,我如仍不肯写此序,那末对于孙晶同学的这本书来说,可能会造成某种缺憾。考虑到这一层,我也只好打破一般不为人写序的惯例,忝为此序了。

孙晶同学师从李炳海先生读博时,主要是从文化学的思路研究汉赋。我以为她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应在保持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拓展。我的建议有三个方面:一是要树

立世界性的学术眼光,二是从文体学的思路再探索,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应更上层楼。经过李炳海先生的培养,孙晶同学在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志趣全在学问上的青年,并且比较勤奋。

我记得,她是6月份进站的,我对她的第一次指导是要求她利用暑假到各大图书馆查找外国学者对于中国赋体文学的论述,特别注意外国学者对于“赋”的文体定位。这并不是要她去搞比较文学,简单地讲一些中西比较,并不新鲜,也不能深入;我的目的是要她多向度地去思考赋的文体定位,其目的还是落实在文体学思路上的。也就是说,我对她的建议的第一、二点是相互关联的。

那一年夏天,她便辗转于各大图书馆之间了。8月中旬,她到苏大来向我汇报她查找国外资料的情况。后来,她根据搜集的材料,写出了博士后出站报告的第一、二章:西方学者视野中的赋与东亚学者视野中的赋。以我孤陋的见闻,似觉得还没有人系统地梳理过上述问题。

综观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赋的文体定位,都是困惑的。这是赋学研究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我一向以为,严肃的研究是不能绕过难题的。自1998以后,我的主要精力是在对20世纪中国各体文学及其理论的变迁发展的研究上,从这一研究中,我有了一个觉悟:文学研究,如果不能深入到对文体起源,及其内在矛盾的体认上,那末就无法深层次地揭示这一文体的流变。这一认识,当然与我在《中国中古诗歌史》中即已提出并已加以运用的活的逻辑学思路,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以看出,我对孙晶同学的建议的第二、三点也是相互联系着的。然而,要认识某一文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岂是易事?非对这一文体的发展做

过较长时间的研究,是无法认识的。

指导博士生及博士后,有一个困境:如果让他们写作你已经研究过的题目,导师对学生所写的对错自然较有判断的把握,然而,学生往往又难以跳出导师思想的圈子。如果让学生完全自己研究,而导师讲不出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意见,则学生又何必到你门下来研究?出于上述考虑,我以为学生最好不要在导师已经研究得比较深入的领域中选题,但导师对学生仍应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这些指导意见,来源于导师平时所孕育的一些片断的学术思想,乃至猜想,来源于导师出于自己的研究经验对于新的课题的一些直觉性的想法。导师的优劣,应该从他对于广泛领域中的课题的把握能力,他平时积累的种种处于萌芽状态的学术思想的正确性、深刻性、可开掘性,以及他的方法论思想对于学生的研究工作所能具有的提高作用上看起来。

2002年8月19日,我对孙晶作了第二次指导,讲赋体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这次谈话比较长。第二天,8月20日,孙晶对这次谈话做了整理。

以我工作的习惯,向学生讲述我对一些问题的片断的想法、猜想,虽在教学上是必须的,但要形诸文字,我并不愿意。迄今,我所刊出的论著,自问都是经过对某一研究对象做整体把握后而写下的,因此对这些文字我还是略有些信心的。我一般不为人作序,包括我自己指导的博士生与博士后,因为,我想序最好能讲出一些学术观点来,而未亲自作过整体的研究,就公布自己对一些问题片断的想法、猜想,是冒险的。这也是我推辞为孙晶此书写序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多年中,我对我带的博士及博士后的指导次数是相当多

的,但所说我基本都忘了,因为我从未想过要将之集录起来,以便出一本诸如《讲学录》之类的书,脑海中的点点露珠,一次次地化入到了学生们论文的机体中,它们有了另外的生命,我感到庆幸。然而,现在孙晶两次劝我把对她的指导写下来,供赋学界参考。并且难得孙晶如此有心,一直将整理稿保存至今。这令我颇为踌躇。考虑到应略以表示我对于我的“指导”的负责,并免得写下一篇充满敷衍之词的“序”:我只得第一次破例,据此整理稿,并稍加引申,将我对“赋”的未曾深入研究过的想法写列于下。

二

章太炎说:“古代凡兵事所需,由民间供给者谓之赋。”“于收纳民赋时,必须按件点过,赋体亦因须按件点过而得名。”^① 作为一位小学大师,章太炎试图从“赋”字的本义出发来立论,然而,撇开了赋体形成的原因,直接将“赋”字的本义与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赋”的得名联系起来,显然是过于简单化,而缺少说服力。郭绍虞则同意刘勰“六义附庸,蔚成大国”的看法,他说:“赋之源合于诗,而其末却不同于诗。”他又引《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之语,而曰:“诗、赋的分别又是一能歌唱一不能歌唱”,“‘铺采摘文’,所以宜于诵”。^② 台湾张清钟在《汉赋研究》中说:“赋之本义依古籍所载有二:一为敛租;二

① 章太炎:《国学概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2页。

② 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见彭黎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散文·赋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版本下同),第276~277页。

为点兵。”“赋字始用于文学指‘不歌而诵’之谓。”^①但他未能说清“赋”字之由敛租、点兵之义，是如何向文学体裁的名称过渡的。

胡怀琛《赋辨》云：“赋者，诗、歌之流亚也。”^②这似乎是说，赋是从诗歌中衍变出来的。褚斌杰则从“不歌而诵”的记载出发，划断了赋与诗的关系，他说：“赋，做为一种文体，它与《诗经》‘六义’的所谓‘赋’，并没有什么源流、演化关系。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来源于民间，其名称取意于‘口诵’，与《诗经》表现手法之一的所谓‘赋者，铺也’，含意也是不一样的。”^③可以说，褚斌杰的意见是反对刘勰的论述的。

由于对赋的起源认识不清，因此对于赋的文体属性的看法也彷徨摇摆。曹聚仁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赋到底是什么，是诗还是散文》，他的意见是：“赋是中国所独有的中间性的文学体制；诗人之赋近于诗，辞人之赋近于散文；赋的修辞技巧近于诗，其布局谋篇又近于散文。”^④然而扬雄所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是一个以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而作的划分，班固说得十分清楚：“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竟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⑤

我对赋的起源的看法如下：《说文》曰：“赋，敛也。《周礼·

① 张清钟：《汉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页。

② 见彭黎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散文·赋卷》，第286页。

③ 褚斌杰：《论赋体的起源》，《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四辑。

④ 见郑振铎、傅东华：《文学百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61页。

⑤ 《汉书·艺文志》，《汉书》卷三十，第6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版本下同），第1756页。

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① 据此，“赋”这个字是表达收取、给予财物的意思。《左传·昭公四年》亦曰：“郑子产作丘赋。”^② 赋指税，故有“赋税”一词。一个关于财富的概念怎么变成了文学的概念呢？《汉书·艺文志》云：“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所谓不歌而诵即是朗诵。诗是合乐的，但也能供朗诵用。在春秋时期聘交盟会之际，或者是大夫们聚会之时，往往朗诵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此即赋诗言志。使用《诗经》中的成句，是赋；以后，自己即景即情作诗，亦谓之赋。所谓“升高能赋”^③和“登高能赋”^④应该包括用成句与作诗两种情况。“赋诗”的初义应是用诗，这与“赋”字的原始意义是财产，是“可以用的”相关。以后作诗亦可谓赋，此一用法，我们在后世以“赋得”为题的诗上仍然可以看到：萧纲有《赋得蔷薇诗》，张正见有《赋得落落穷巷士诗》，诸葛颖有《赋得微雨东来应教诗》，虞世基有《赋得戏燕俱宿诗》，白居易有《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样，作为租税、兵赋之赋已过渡到文学的应用上。

登高、盟会时赋诗，有两个功能：一是表达心中之所想，一是抒写眼前之所见。后一功能，自然会使所作向着直陈其事、敷布其词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以为，赋不是直接从诗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萌生的。班固说：“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

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54页。

③ 《鄘风·定之方中传》，《毛诗正义》卷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版本下同），第316页。

④ 《汉书》卷三十，第六册，第1755页。

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惻隐古诗之义。”^① 这里有一个人们从未提出过的疑问，既言“学诗之士”，为什么不说法“贤人失志之诗作矣”呢？对这个疑问应从上文索解，上文明说“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这是说赋诗言志的活动不再存在了。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贤人失志之赋作矣”一语，是从赋诗言志活动的沿承与变化上来说的，此愈证我在上文提出的，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这一意见。

对“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一语，班固解释说：“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章太炎更是说：“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② 显然，所谓“登高能赋”是有身份性专指的。所谓“赋”既有感物造端之意，又有微言相感之意。屈原的作品，符合这两个意思，故屈原作品被称为屈赋，而不被称为屈诗，良有以也。我们可以看出，赋在兴起中有两个规定性：第一，所谓“逸在布衣”一语，表明赋的作者的 identity 变化，这使得赋可以在庙堂与民间的两个层次上被使用。第二，抒情与写物兼具。汉大赋之润饰王泽，以及赋作之长期为高层文人所重视，是其作者贵族身份的表现。京都、苑猎、述行、序志、抒情等各类赋的产生，则是抒情与写物兼具这一功能的细化。

赋在文体上的定位，有一本教材说，它是诗的散文化，又是散文的诗化，这一说法，其实便是上文所引曹聚仁的观点的延

① 《汉书》卷三十，第六册，第1756页。

② 章太炎：《国故论衡·辨诗》，《国故论衡》中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续,是一种回避问题的说法,其实际效果反而混淆了问题。

我的意见是,既然赋产生于赋诗言志的活动中,那末赋只能是诗的散文化,怎么可以说成是散文的诗化呢。将赋说成是散文的诗化,从文学史的发展上说,是十分荒谬的。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赋在功能上比诗广,究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诗的散文化,因而描写能力更强。赋是藉助于诗而兴起的,因此它与诗便有了不解之缘。西晋诗骈仗大盛,陆机的《文赋》诸作亦已用俳体,此骈赋也。唐代律诗产生,随之而有了律赋。——虽然基源于汉语言文字特征而产生的俳偶及声律化追求在散文领域也存在,但这一发展趋势毕竟主要是由诗歌领域来引导的。——然而,赋的特征在于它比诗铺写得开。刘勰说:“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① 赋藉诗以兴起,但它逐步有了自己的特点:结构上,遂客主以首引;描写上,极声貌以穷文。这时,便如刘勰所说,产生了“别诗”“命赋”的变动,亦即一种新的文体产生了。

对于古代文人来说,文体的分类本即十分细致,赋就是赋,已经定位好了。对赋的定位感到困惑,是四体划分的现代文体观确立以后的事。四体划分的文体观要求将某一文体纳入到其某一种文体中。对于赋定位的困惑,在郭绍虞的论述中即已表现出来了,他说:“当现在语体文盛行的时期不应当有语赋——白话赋——吗?”“白话赋是什么?也许便是一部分的散文诗,也许便是与古赋性质相类的小品文字。”^② 散文诗,在“五四”及

①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版本下同),第134页,“遂”,许云当作“述”。

② 见彭黎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文精粹:散文·赋卷》,第281页。

其以后的一段时期中,是被看作属于诗的;而小品文则属于散文。那末所谓“白话赋”是亦诗亦文了。赋介于诗文之间,或是亦诗亦文之说,盛行于今,表明了因无法将赋纳入到四体划分的文体论中的一种窘迫。

我的意见是,就目前的四体划分的文体论来说,赋应属于散文。从赋的形成上来说,章学诚有一段话说得比刘勰更详细:“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①由此可见,赋体的成形从散文上吸收的营养,远过它原本的《诗》。从性质上说,我以为判断散文与诗,应从“诗性”与“散文性”的概念上来加以判断。当赋诗言志,以微言相感时,赋诗者需要一种想象力,听者则需要一种悟解力,此时,诗性是比较强的;当赋直书其事、以铺张声势为能事,以外在的侈丽闳衍之词相较胜,而竞于使人不能加时,其所表达的意义就相当朗畅了,此时,赋的散文性自必极为突出,即使仍有讽谕之意,览者已经是劝而不止了。从文学史后来的发展上说,当古文运动战胜骈文后,宋人即创出了“文赋”。由此三者,足证赋属于今之所谓“散文”也。

赋的定位明确了,赋体的内在矛盾也就清楚了,赋所原本的诗性与其散文化的走向之间的矛盾,是赋体文学的内在矛盾。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的划分,就是这种矛盾的一个典型的体现。所谓“没其风谕之义”,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说,便是隐喻之意不受作者及览者重视了。上文已经说到,俳

^① 《文史通义·校讎通义·汉志诗赋》,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64页。

赋、律赋的产生,都与诗在语言运用上的进展有关,是赋与诗亲缘关系的表现,文赋的出现则是赋挣脱这种亲缘关系的一个结果。徐师曾说:“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则矣。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至于律赋,其变愈下,……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①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即使是俳赋与律赋,虽吸取了诗歌在形式上的技巧,但从总体上说,其在内质上仍与诗歌有相当的殊异。外形上的诗化与内质上的散文化,仍然是上述内在矛盾的一个体现。

三

以上关于赋之所述,虽然不能说没有我平时的阅读及思考作为其基础,但对于赋体形成过程及其矛盾的认识,是要放到对赋史的整体性研究中加以验证,并从这种验证中再加以修正,才能符合文学史的真实的。也只有这样,它才能进而形成对于赋史加以论述的一个正确的逻辑结构。

我所指导的博士与博士后,在我所建构的方法论中,往往采用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作为他们写作论文的依凭,其实,多数同学常常也只取了这一方法的最浅表的一点,即研究应逼近文学的原生状态。但我在一些论文及拙著《文学史新方法论》已经一再说明过,原生状态也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其实是对于复杂的变化中的事物的一种整体性的把握方式,它是不

^① 《文体明辨序说·赋》,《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版,第101页。

能仅仅从反映论的角度加以理解的。至于我所倡导的活的逻辑学思路,因其难,则甚少有学生加以运用。孙晶同学以高标准要求自己,意在将我的新逻辑学理论贯彻于她的研究之中。无论其成效如何,她的这种勇气,是可嘉的。

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终生投入的事业,与其他事业一样,它也要求高的起点与持续的努力。孙晶同学这本书的出版,使得她有了一个较好的起点,相信以她的后续努力,将能逐步取得更大的成绩。

兹为序。

2007年2月4日于苏州,时当立春

2月6日略改